

# 毛泽东与地方文化

■ 薛正昌

毛泽东读书范围十分广泛,地方志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与地方文化的渊源,一是“得江山之助”的游历;一是大量阅读古代典籍,包括地方志书。游历使他观自然而悟道,历名胜而通掌故;大量典籍阅读,使他通晓中国历史;大量地方志书的阅读,使他谙熟地方文化,研究地方文化,体现了他深谙“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治国思想和理念。

[关键词] 毛泽东读史; 地方志书; 地方文化; 资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1)10-0179-05

薛正昌(1956—),男,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与文化、旅游文化。(宁夏银川 750021)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位在社会科学许多领域学识宏富的杰出学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即广泛涉猎群书,读书生活伴随他的一生。他读中国古籍,上自经史子集,下至稗文小说,无所不包,对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化的汲取、继承和研究、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地方文化史志典籍,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一生与地方文化缘分甚浓,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月,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非常重视搜集和阅读“一方之总览”的地方史志,谙熟各地山川形胜、物产资源、民俗风情、文化古迹。

毛泽东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和渊源,历史地考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得江山之助”的游历,一是大量阅读古代典籍,特别是大量阅读地方志书,“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他也多方搜罗”<sup>[1]</sup>。可见,毛泽东渊博的历史学识,是在刻苦勤奋、孜孜以求的读书经历中获取的。

## 一、地方志书所承载的地方文化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记载全国各地地情的地

方志书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地方志书包容的地方历史文化,是极为丰富和珍贵的。在记述一个地区历史与文化并传承方面,地方志书是最全面、最为详尽的,如山川风物、生态变迁、史迹人物皆在其中。尤其是后人追溯和审视前代某一个地方的全部经历时,更唯地方志莫属了。

现在看到的地方志书,都是按一定的行政区划形成的。从省志、府志,到州志、县志皆备。地方志书只记载本地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涉及全国的事件和人物,基本记载与本地区相关的内容,承载的是浓郁的地方历史文化气息。因此,地域性、综合性、资料性、连续性,是地方志书的四大特点<sup>[2]</sup>。地方志书丰富的资料信息,科技信息,包括农业、水利、气象、灾害,地方工商业发展史料、宗教史料、文化景观、描写地方历史文化的诗文,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等,它是历史遗留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因此,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特别提到和介绍了中国的地方志书,并且引用另一位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的话说:“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

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sup>[3]</sup>因此,毛泽东非常看重全国各地的地方志书。

毛泽东读书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著作到西方名著,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也包括美学和宗教哲学等。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须作两方面的调研,其中之一就是向书本作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包括古人写的与当地有关的诗文。这些历史文化信息的获取,就是借阅当地的地方志书、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sup>[4]</sup>。

## 二、观自然而悟道

旅历自然与获取大量地方历史文化信息,实际上体现的是两大方面的内容:自然景观与地方文化。每一处地方的自然文化景观里,都融注着地方历史文化。

中国地域辽阔,江山多娇,山水游历早就引起先民们的浓厚兴趣。《史记·五帝纪》载黄帝登名山、涉大江、观沧海,足迹遍布东南西北,西周穆王御八骏而驾六极以远游万里的故事,亦令人向往。司马迁“得江山之助”的感悟,深深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文人贤哲的心态。毛泽东亦不例外,他极为推崇司马迁的游历和豪侠胸襟之气,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在《讲堂录》中说:“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矣”,“游之为益大矣哉”。深得古人游历之“悟”。

《论语·雍也》篇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西汉初年的韩婴解释说:“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子问,似有智者;动之而下,似有礼者;历险致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平,或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水也。”“夫山者,万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体焉,出云道风,从(耸)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也。”(《韩诗外传》卷三)这就是说,君子有山水之风。毛泽东“游之为益大矣哉”所涵盖的丰富内容与古人观山水以比德的道德品性的修养、意志的锻炼、人与自然关系的体会感悟相一致,且有过之。

第一,游历山水过程中的自然比德说,其意义在于自然美的实质,是自然物的属性与人的某些品德相类似,人可以从审美客体意会到审美主体的某些品德,即

自然物象与主体感知之间有一种同态对应。现代文艺美学称这种现象为“通感”,青年毛泽东将此概括为“知觉类化”:“解甲物而有通乎乙,思此理而有会乎彼。大宇之内,万象之众,息息相通,是谓知觉类化。”(《讲堂录》)看来,毛泽东的游历,其目的在于自然与人的关系,而不是脱离人类社会单纯欣赏自然美。

第二,游历的过程,就是了解社会,丰富知识,积累素材的过程。主张天人合一、师法自然,既是传统文化思潮,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古人在观赏自然变化之时,注意总结其中的运动规律,探寻客观世界蕴含的奥秘,用以指导人们主观世界和社会实践活动。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说:“胜景、古迹、险隘、民风,以及通商之步举,游程之所必记。”他将游历观赏与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体察风情、民俗。毛泽东刚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给学生出的第一道作文题就是,“试述本地方的风俗习惯”<sup>[5]</sup>。前面的“所必记”,就是记载游览观赏之所感悟。韩非在其《大体》篇里说过:“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大人奇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主张“大人”应从观察天地、江海、山谷、风云等自然现象中,悟出顺应自然人生的哲理来。毛泽东所说的“胜景、古迹、险隘、民风”,涵盖了古人对大自然体察感悟的内容。

第三,遍游四字,既可开拓胸襟,也可激发丰富的想象。《孟子·尽心上》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力主站得高,看得远,视野开阔,心胸就豁达。毛泽东认为:“观视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他登山观海得来的这种感悟,激发的神思与想象同古之贤者如出一辙。这在表面上是讲观赏山水的感受,实际上也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规律。

第四,游历名山大川,以增阅历,长见识,悉心了解地方文化掌故,积累丰富的地方文化知识。古之贤哲出游,除赏心悦目之外,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如观民风,知得失,明教化。毛泽东早年的游历也是如此。历代文人游览名山大川,主要是感受一种文化氛围,结交高人贤士。故他认为:“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这是他游

历的目的之一。概而论之,毛泽东在游览名山大川、感悟自然的同时,了解和熟悉了丰富的地方文化。

### 三、历名胜而通掌故

青年毛泽东在大量阅读古代典籍的同时,十分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社会生活实际,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夫善积而成者,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讲堂录》)所以他对司马迁写作《史记》遍游名山大川,广泛调查研究的学风至为钦佩,“马迁览潇湘、登会稽、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其胸襟乃广矣”(《讲堂录》)。早在1916—1917年,毛泽东即曾利用暑假接连作过两次“游学”式的社会调查,游走了湖南的十多个县。他主张救国富强计,必须注意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这种“游学”式的社会调查,是其了解、熟悉和掌握地方文化的最佳形式之一。

1918年8月,毛泽东与湖南第一批准备留学法国的青年赴京,东抵河南郾城漯河寨时,路途受阻,他便乘机考察了漯河一带。1920年4月离北京南下上海途中,他又作了一次特殊的旅行,绕道寻访和游览了不少古迹名胜。十几年后,他对这次游览的一些细节还记忆犹新,“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并且看到了孔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sup>[6]</sup>,领略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情怀。

览四方亦可知政。也正是这次长途旅游,使他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另一面。当时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掀起了他内心的世界风景。历史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千古伟绩激励着他的雄心壮志,沿途中国社会处在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的贫困状况,更使他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一面是五千年灿烂文化,一面是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历史和现实进一步促使他产生“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sup>[7]</sup>的想法,便放弃赴法学习,从此投身革命生涯。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早期游历,不仅使他获得了大量而丰富的地方文化知识,而且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毛泽东酷好游历,钟爱山川,这种个性气质几近伴其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年都抽出一部分时间巡视、游历<sup>[8]</sup>,直到晚年。20世纪60年代,他同工作人员聊天时谈

到他的三大志愿,其中之一便是骑马到长江、黄河两岸实地考察。<sup>[9]</sup>毛泽东一生的游历,无论从革命家、政治家的角度,或艺术家、诗人的角度看,其游历名山大川所获得的地方历史文化知识,所养所发的浩然之气,与其豪放的人格、坚毅的意志、开阔的思路、奇异的想象形成了高度的融合,特别是他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见识和积累。

徐州,古称彭城,为历史上“楚汉相争之场,南北朝屯戍之所”,故“遗台故垒,掩翳榛莽,陵谷迭变,风烟犹昔”。毛泽东对徐州这个历史古战场的历史不仅有深刻的了解,而且倾注了感情。1936年,他在陕北同作家埃德加·斯诺谈话中回忆说:“在我一次到北方去而值得纪念的旅行是这些在北海溜过冰。……在三国志上有名的徐州城墙,以及历史上有名的南京城,我都走过一圈子。……那时候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步行游湖南以外的有价值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数次到徐州,旧地重游。1957年,毛泽东与秘书克林乘飞机经徐州前往南京途中,在与克林的聊天中又提起元代诗人萨都刺的《徐州怀古》,不但写出了词的原文,还讲述了这首诗的来龙去脉<sup>[10]</sup>。有一年,毛泽东坐飞机经过南京上空,他即兴手书了南宋词人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京口北固亭在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毛泽东不仅熟悉京口的地理方位与辛弃疾词的意义,而且熟悉京口与三国时期的特殊关系。可见毛泽东博览中国历史典籍和古代诗文、通晓和谙熟地方历史文化的程度。

在战争年代,熟知关隘山川形胜所在,更有利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并取得胜利。美国学者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说:“毛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战役中,在他的国家的广袤的土地上,他看到了青年时期读书时想象过的宇宙山峦。”<sup>[11]</sup>这里不光是“读书时想象过的宇宙山峦”,还包括他游历登临的关隘形胜。

### 四、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被称为“一方之总览”的地方志书,它荟萃了一定地区历史上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科技资源等方面的大量珍贵原始资料,对于人们探索与总结历史经验,认识一方地情,鉴古知今,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现存8000多种旧方志,不但是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毛泽东对此有充分

的认识,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这既是对古代文化传统的继承,更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善举。

地方志,实际上就是地方史。无论是在艰难困苦战争环境,还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代,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地方志书的搜集与阅读。“毛泽东每到一处,首先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化掌故及风土人情等,这已成为习惯。”<sup>[1]</sup>因为“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沿革,知要害,察风土,纤介毕书,树石无漏,幼盈百轴,岂所谓摄机要者乎”(《通典》卷171《州郡一总论》)。这是有其渊源的。地方志,就是按政区记述地方事物的典籍。毛泽东认为,地方志书详细记载了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是极其重要的书籍,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他年轻时熟读的地方志类的重要书籍之一,就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在战争年代,地方志书往往成为毛泽东决策的依据之一,特别是山川形胜,要隘险要时。1929年,红军打开兴国县城,毛泽东在图书馆一住下,就开始专心致志地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毛泽东拿到了清代续修的一部八卷本《瑞金县志》,如获至宝,挑灯夜读。长征途中,环境险恶,战斗频繁,但他仍不放弃读地方志书。他的机要秘书黄友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一次部队打了大胜仗,夜间宿营时,主席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便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过去,主席却说不是这个:“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sup>[12]</sup>1936年8月,为在国内外扩大红军影响,毛泽东决定汇编出版《长征记》并征稿,请有关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同志择取他们在长征中所经历、听闻的行军打仗事迹,地方风俗,奇闻轶事以及部队工作精彩有趣的片断写成文章寄到红军总政治部<sup>[13]</sup>。毛泽东不仅大量阅读地方志书,而且注重搜集整理地方文化。在延安时,毛泽东阅读地方志书,了解地方文化的兴趣有增无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地方文化尤为重视,一方面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书,一面仍如饥似渴阅读各地志书,他每到一处巡视,都要开出一批书单,其中就有地方史方面的书。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说到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书里不仅记载了地理情况、建制沿革、名胜古迹、民间传说、风土

景物,还记载了各地河道水系的走向变迁与城邑兴衰的地理现象。同时,他非常推崇郦道元的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精神。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他到达成都后立即寻找《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四川地方志书,阅读后又借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并在这些书上批划圈点,还将《华阳国志》发给与会同志,要大家都了解这些历史。同年,毛泽东邀请张治中一起去安徽视察工作时,又借来《安徽省志》阅读,进一步了解和熟悉安徽情况<sup>[1]</sup>。1959年6月庐山会议期间,他又阅读了《庐山志》、《庐山续志稿》。在广东汕头,读《汕头县志》、《潮州府志》;到无锡当晚就浏览了《无锡县志》。毛泽东读地方志书如此广泛而认真仔细,以至有时了解的地方人文地理甚至比那些长期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还多。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与国家领导人有过多次会面,每次接触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裘盛戎在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演《赤桑镇》,演完后,毛泽东健步走上舞台与演员们握手。当毛泽东微笑着与裘盛戎握手时便问:“盛戎同志,你知道赤桑镇在什么地方?”<sup>[14]</sup>《赤桑镇》里的这段历史与包拯有关,毛泽东自然通晓。

由以上几个方面,已足以看出毛泽东谙熟中国地方文化,十分关心地方文化,对地方志及其所承载的地方文化了如指掌。明于此,并以此为鉴,方才有利于“郡国”之治。

## 五、影响与启示

毛泽东不仅通晓中国历史,而且谙熟中国地方文化。“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名言,正是毛泽东读史的最好脚注。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十分爱读,他说这部书“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可“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sup>[1]</sup>。而中国地方志书,更是“治郡国之鉴者”丰富的地方文化遗产,其本身就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因而,志书为历代所重视,更为毛泽东所青睐。战争年代,可以凭借志书提供的情况打胜仗;和平建设时期,又可以凭借志书“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即可正确认识地情,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对积累资料,进行多种学科的研究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毛泽东通晓历史典籍,谙熟地方文化,既是他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典范,也是他藉此认识

地情、国情,进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科学依据。

在追溯毛泽东与地方历史文化的同时,我们对毛泽东阅读地方志书的前后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也看到了地方志书为毛泽东所提供的历史文化参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影响和作用。历史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之风,包括哲学思辨、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克服困难与解决矛盾的方法等;通过历史故事来吸纳地方志书中有益的成分,借鉴历史经验,用以治理国家,用以教育党的高级干部等。毛泽东读史,读地方史,对帝王将相、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等都会有客观的评价,“而高于这一切之上的,则是毛泽东多着眼于对革命现实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启示”<sup>[1]</sup>。这就表明,这种“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启示”,不仅影响着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对后人同样有着多重启示作用。

启示之一:透过毛泽东与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入接触和研究,为后人学习和研究历史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毛泽东“读史”的坚韧精神和“用史”的科学态度,对其后新时代有着多重启示。时代不同了,但中华民族传承的文脉背景绵延不断,推动历史进程的文化积淀是一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进程同样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支撑。在倡导学习型社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倡导和学习毛泽东读史的精神。古为今用,以弘扬和彰显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传承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启示之二:在倡导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今天,领导干部尤其是从事地方行政管理的“父母官”,在注重读史的同时,应该多接触当地的地方志书。在充分了解和研究地域历史和文化的同时,施政思想和理念应该与当地自然历史背景、生态环境相一致,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造福。

启示之三:发掘地方文化资源,打造旅游文化品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党的执政理念之一。地方志书所承载的地方历史文化,是挖掘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潜力所在。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里,就曾广泛参考、引证了不少地方志的史料。当前,各地充分挖掘地方人文资源、自然经济环境资源和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开发旅游文化,发展旅游事业,已成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毛泽东获益地方文化的经历、对地方文化的谙熟程度和综合研究的历史,已成为我们的光辉典范。在大力加强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今天,地方文化研究已成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立足于本地,切实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过去和现状,更要研究它的未来,将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一方山水,养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将支撑起一方诱人的蓝天。

### [参考文献]

- [1]张贻玖.毛泽东读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 [2]周迅.中国的地方志[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
- [3](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5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
- [4]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87.
- [5]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6]高菊时.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J].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2).
- [7](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
- [8]陈雪.青年毛泽东的文艺创作观及其文化性格[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2).
- [9]张仙明.为了人民……[J].当代,1979,(2).
- [10]丁志刚.毛泽东圈点过的彭城怀古[N].中国文物报,1993-05-02.
- [11](美)特里尔.毛泽东传[M].刘路新,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 [12]孙宝义.毛泽东读书生涯[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
- [13]胡绍华.毛泽东和文献编纂工作[J].档案通讯,1985,(6).
- [14]王铁梁.毛泽东看《赤桑镇》[J].传记文学,1993,(1).

【责任编辑:王立霞】